

真光書院的建立及其歷史影響

孟育東*

摘要 鴉片戰爭後，中國的教育走上近代化歷程，其中西方教會在華所辦學校起了一定作用，女子教育更是以教會學校為肇端。在廣州，美北長老會特別注重教育及醫藥傳教，會中傳教士那夏理創辦的真光書院對於新教在華傳播及中國教育近代化產生了一定影響。

關鍵詞 近代教育；真光書院；女子教育

鴉片戰爭後，中國的教育走上近代化歷程，其中西方教會在華所辦學校起了一定作用，女子教育更是以教會學校為肇端。近年來關於教會教育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然而在現有相關研究存在兩種傾向，一是關注高等教育研究頗多；二是關於教會教育的宏觀的和區域性研究較多。相對而言，在學校數量及學生數佔優勢且分佈較教會大學更廣泛的教會初等及中等教育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關於教會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個案研究很少。那麼究竟是甚麼原因促使教會教育廣泛開展？近代教育和基督教傳播有何關聯？對於中國帶來甚麼影響？本文以真光書院（True Light Seminary）的建立及運作為個案就以上問題展開研究，不當之處，祈請方家指正。

一、傳教士在華傳教教育的開端

十九世紀是基督教第四次在華傳播的高峰，表現為新教傳教士的活動對中國近代化產生的影響較深。1807年，新教傳教先驅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年）揭開新教在華傳播的序幕。因清廷禁教政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馬禮遜的傳教收效甚微——直至1814年才有一個叫做蔡阿高的人經其施洗成為第一個華人信徒。當時的情景如下：

高山之麓，罕有人跡，有水一溪，迂回凝碧，予於是地奉父子聖靈之名為彼施洗，祝彼為吾道收穫之第一佳果也。¹

傳教的艱辛和風險可見一斑。到1832年，中國才有十名新教信徒。裨治文（Elijah Bridgman，1801-1861年）1830至1835年間在廣州傳教，竟無一人信教。²通過長期實踐，馬禮遜發現文字、教育、醫藥等“文化傳教”較易為華人接受，因此他將活動重點放在傳播西方文化、創辦教會學校方面。馬禮遜是開創基督新教在華教育事業的先行者。

（一）鴉片戰爭前傳教士創校實踐

起於康雍年間的禁教政策到鴉片戰爭前仍未解除；英國東印度公司害怕傳教士的活動激起中國政府進而影響其商業利益，嚴格禁止公司船隻搭載傳教士前往中國傳教；加之信奉天主教的澳葡當局仇視新教，新教傳教士在華活動受到極大限制。在此情況之下，其傳教方式開始發生變化。

1818年，馬禮遜等在距離中國較近、華僑雲集的馬六甲創辦“以交互教育中西文學及創辦基督教理為宗旨”的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³此為第一所以華人為主要教育對象的新教教會學校。同年，傳教士麥都司（Walter Henry Medhurst）在馬六甲開

*孟育東：毛澤東同志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館員。

設三間招收華人子弟的學校。之後幾年中又有數所專招華人女性的學校在新加坡和馬六甲建立。除英華書院外，學校規模一般都較小，課程設置簡陋，通常是由一兩個傳教士加上延聘的一個中國教師和四五個學生組成，傳教士負責宗教方面的課程，有時還教英文，中國先生教授中國傳統典籍。學校持續的時間較短，大多都只有幾年。所收學生素質也較差。傳教士在南洋辦校對中國本土的教育進程產生的影響不大，其實踐和摸索的意義更大程度上是為鴉片戰爭後新教傳教士在中國國內大規模興辦教會教育提供了歷史經驗和借鑑。

新教傳教士在南洋展開教育傳教的同時，中國國內的教育傳教也在進行。1828年，中國的第二位信徒、第一位華人牧師梁發在其家鄉廣東高明縣設私塾收徒佈道。該私塾被視為新教在中國內地設校之始，除了學習傳統典籍外也傳授聖經，介紹西方的科學、地理知識以及英文，但不久即被官府查封，梁發逃往澳門躲避。⁴後來裨治文在廣州開設了一間規模很小的學校⁵；1834年，傳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年，又作郭實臘、郭實獵）的妻子在澳門開設寄宿制學塾，學制三年，教授英文、地理、歷史和寫作，以英文講課。容閱即為該校學生之一。⁶

1835年，為紀念馬禮遜，旅居廣州的美國人和英國人成立“馬禮遜教育會”，以在華開辦學校並供給經費，教當地人英語、西學和基督教義。教育會成立後，敦請美國傳教士布朗至澳門籌辦馬禮遜學校。1839年11月，學校正式開學，首批學生有六人，均為貧困人家子弟，他們是黃勝（Wong Shing）、李剛（Li Kan）、周文（Chow Wan）、唐傑（Tong Chik，即唐廷樞）、黃寬（Wong Foon）和容閱。⁷學生食宿由學校負擔。所設科目為初等算術、地理、中文和英文。布朗在給差會的報告中描述了馬禮遜學校的情景：

11月1日，我們搬進了教育會購置的屋中，4日上了課，有六名小學生。……

我安排他們半天讀漢語，半天讀英語，早上六點鐘開始，到晚上九點鐘結束，其中讀書八小時，其餘三四小時在露天場地上運動和娛樂。……孩子們和我的家庭混在一起，我們待他們如親生，鼓勵他們對我們具有親密無間的信任，做他們的最好朋友。他們可以自由地參加我們家庭的早晚禮拜。簡言之，我們是在努力使他們感到是同在家裡一樣，給他們一個基督徒家庭的教育。⁸

布朗的目的是為了給學生創造一個較濃厚、純粹的宗教氛圍和環境，減少異教文化和異教徒對學生的影響。布朗所採用的教育方式和內容，如寄宿制、免費教育、引入英文和西方的科學知識都為以後的教會學校所模仿和借鑑。該校是新教傳教士在中國創辦的第一所近代西式學堂，雖然斷斷續續，卻開了先河。

（二）鴉片戰爭對於新教在華傳播的影響

鴉片戰爭後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進程加快。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軍再次戰敗，清政府同英法俄美簽訂《天津條約》，規定清政府准許外國傳教士到內地傳教，地方官吏不能干涉並需行保護之責；中國信徒受條約保護，官府不得壓迫。康雍年間開始的禁教政策被完全廢除，傳教士們夢寐以求的在中國傳教活動合法化在西方的堅船利炮下實現了。傳教士信中稱：

大炮在天朝呼嘯，……這是政治提出的要求，是大炮迫令其實現的。一次我信步走到一個城門口，城牆上似乎永恆地寫着：“洋人莫入”。我是一個洋人，又是一個傳教士，我看到了牆上寫的那句話，可是我不顧一群在場中國人的驚訝，闖進了城門。時候已經到來，我們已經沉默到今天，現在是可以到中國城市的大街上，提高我們的嗓門大喊大叫的日子了。⁹

十九世紀下半葉被稱為西方傳教運動的“黃金時代”，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在內

神話與宗教

的西方傳教士大量湧入中國這個亞洲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傳教工場。其中美國新教傳教士表現出色並逐漸佔據優勢，尤其是女性。美國新教女傳教士在大覺醒運動推動下，自 1830 年代開始紛紛來華，到 1900 年以後美國派出的傳教士數量已超過英國，居歐美各國首位。據《中華歸主》統計，190 至 1920 年間各國來華的新教教會 130 個，美國佔 65 個，英國佔 35 個。1920 年在華外國傳教士有 6,636 人，來自美國的有 3,305 人，佔 50%，其中女傳教士有 2,104 人，佔 2/3。¹⁰

廣東是新教教會在華傳教的第一站，也是最重要的一站，當時在廣東傳教的有二十幾個差會。鴉片戰爭後到廣東傳教的新教差會中，美北長老會是轄區最大、投入傳教資源最多、影響最大、效果最佳的差會。在廣州，美北長老會特別注重教育及醫藥傳教，會中傳教士那夏理（Harriet Newell Noyes, 1844-1924 年）創辦的真光書院對於新教在華傳播及中國教育近代化產生了一定影響。

二、真光書院的建立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傳教士便已注意到中國教育的落後，通過考察，指出該城約有三十間書院，但沒有一間具備適當設施；其中一些甚至已經荒廢了。最大的三間擁有約二百名學生，全校卻只有一兩位教師。學校在課程與規劃方面極不完善，對如何培養學生適應現代社會缺乏清晰的看法。那夏理也看到了這點，¹¹其來華後開始創辦學校，宣傳教義，真光書院由此誕生。

（一）真光書院的創辦

那夏理，美北長老會傳教士，那氏在來華前接受了完整而系統的教育且“學習成績常名列前茅”，大學畢業後，那夏理應徵入伍管理一間能容納 1,200 多人的醫院，且秩序井然。並且她具有晚清美國來華女傳教士共有優點：

信仰虔誠、受過良好教育、有較強的獨立工作能力、思想偏於保守、有較強的社會責任感和宗教意識。¹²這些為日後其來華創辦真光書院積累了管理經驗。

1868 年 1 月 14 日那夏理到廣州後開始“讀中文，學粵語”“每天以六小時時間專心學習”“不久遂能說流利之廣州語矣”¹³克服語言困難後，她便開始了最初的宣教活動，佈道對象為婦女及女童。早期在華傳教士的佈道方式有兩種：一為送福音入門，一為把聽眾吸引到家中。那夏理最初採用前者。但不久她發現即便當地婦女歡迎外國女傳教士到家裡，當新鮮感消失或家中男子認為傳教士過於頻繁的家訪對其造成負擔時，傳教士就不再受歡迎。之後，那夏理試讓當地婦女來家裡觀看西方風琴、書籍等，向其解釋各種物品的設計和使用技巧，以激起她們的好奇心借機佈道。但當好奇心得到滿足、那氏試圖宣傳福音時，這些人卻已失去興趣。¹⁴那夏理意識到必須建立一所女子寄宿學校以便傳教。和直接佈道相比，寄宿學校有如下優點，一是有了固定的佈道場所，對固定的聽眾作系統的傳道；二是基於中國人的男女禮防觀念，須由女性向女性傳道；三是中國人的排外心理強烈，由中國人向中國人佈道會取得最大效果，故採取學校訓練本地婦女作佈道者的方式傳教。¹⁵1869 年，那夏理進行考察後，那氏將校址選在了金利埠（今六二三路），計劃購地興建西式樓房作校舍，並致函美北長老會闡述自己的計劃，希望教會支持。請求很快被批准，籌建學校成為婦女傳道團的首要工作之一。¹⁶建校活動得到婦女傳道團的大力支持。那夏理稱：

格里爾寫信告訴我已籌集了 700 多美元，而且在隨後的幾周裡會籌集到我所需的 1,000 美元，並問請一個教師需花費多少……¹⁷

在美北長老會婦女傳道團和長老會所屬的其他兩個傳道團體 Mission Bands 和 Sabbath School（以美北長老會婦女傳道團為主，該差

會每年撥 1,000 美元給那夏理維持學校運轉) 的資助下，學校校舍於 1872 年落成。6 月 16 日，真光書院舉行開學典禮，其規模很小，僅有中國婦女和女童六人及女傳教士 Miss Lillie 和那夏理。¹⁸ 那夏理取《聖經》中“是乃真光普照乎萬世之人”，將學校命名為“真光”，後人描述：

一百多年前，有一對兄妹，妹妹創辦“真光”，哥哥受妹妹激勵創辦了“培英”。¹⁹

此處的“妹妹”即為那夏理。那氏確定校訓、校徽和校色：校訓為“爾曹乃世之光，爾光當照人前”；校徽為一顆銀星，謂使學生效法伯利恒之星引人歸主；校色定為黃色和藍色，所以日後真光的學生稱為“黃藍女兒”。那夏理認為，學生只有在學校住宿才能更直接地處於傳教士的影響之下，佈道的效果才會更好，故書院採取寄宿制。²⁰

1875 年 1 月 10 日，真光書院全體師生去附近教堂做主日崇拜，只留一僕人看守校舍。結果做禮拜時，真光校舍被焚毀。當天下午，書院被迫暫時解散，學生返家暫居。次日，那夏理召集會議，商定向美差會求助，差會反應熱烈，Mrs. Perkins 在給那夏理的信中說：

無論你需要甚麼幫助，我們都會盡力滿足你。²¹

隨即婦女傳道團匯來 1,250 美元以重建校舍。幾個月後，校舍在原地得以重建。原來可容納 30 名學生的校舍在重建後略有擴大，可容納 40 人。但學生增加迅速，校舍很快不敷應用，而原來打算購置附近房舍以擴充校舍的計劃也未實現。故那夏理決定遷校至位於長堤仁濟街的新處所，在博濟醫院西側。1880 年，差會同意那夏理再建一座較大的能容納 80 人的校舍的建議。在差會及愛教傳教士的資助下，校舍擴建順利進行。真光的新舊校舍有大禮堂一間、課室四間、食堂三間、住房三十五間，客

床四十張，婦女班住房二十間，全校可容百餘人，充足的空間為真光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

真光書院的建立在廣東近代女子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自其建立後，廣東的女性除了傳統家庭教育模式之外，又多了一條新的接受教育的途徑——學校教育，且隨着時代的進步，女子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日漸取代女子家庭教育模式而成為主要的教育形式。劉心慈²²在其回憶錄中評價道，真光書院“洵開吾粵女子教育之先河”。²³

(二) 經費來源

最初，真光的經費完全由美北長老會婦女傳道團負責，每年提供 1,000 美金。學校初期招生困難，為吸引學生，真光提供免費教育，還給學生提供日常用品和零用津貼。即使這樣，30 個學生的花費加上教師的工資（真光裡的傳教士的津貼由差會另外撥給並不在學校經費之中），1,000 美金已經足夠，其時真光只靠差會的撥付就能維持下去。隨着規模的擴大，教員和學生人數的增加，支出日漸增多，1872 年學校支出的學生衣服費用才 91 元，第二年即 1873 年就升至 180 元，以後又擴建修繕校舍，而差會的經費有限，真光逐漸減少免費項目。到 1900 年，真光開始實施收費，而且不再提供書籍衣服。最初收費一元，慢慢增加到一元五角，後升到四元，一年交費一次。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能力交費，有的可以完全負擔，有的交了一半，有的交費不足一半。起初學生人數略有下降，以後慢慢回升。這表明收費教育不會長遠地影響教會學校的招生人數，而只會影響所收學生的社會成分，教會學校逐漸由貧民學校轉變為貴族學校，所從事的教育也由大眾教育變為精英教育。²⁴

教師和學生的捐助也是學校經費來源的一部分。教師通過各種途徑幫助真光。那氏生性簡樸，為節省費用，自己多日不食肉，甚至在她為真光服務了半個多世紀準備回國頤養之時

神話與宗教

把其平日儲蓄下來的 3,500 元交給劉心慈，由其支配。²⁵ 一位教師給學校的禮拜堂捐了一架風琴，另一位教師在去世後將幾百元的遺產贈予學校，還有一個教師願意幾年不要工資而將錢用來給學校安裝電燈。真光的教師經常拿出一些物品在聖誕節這天來義賣，義賣所得歸學校所有。²⁶ 真光學生畢業後也經常捐款給學校。

以上種種為真光書院的正常運轉提供了物質保障。

三、真光書院的運作機制

在那夏理的主理下，真光書院的運作在 1872 年建校後很快就走上正軌且迅速發展，無論是課程、班級的設置，還是師資、學生的管理，抑或是資金方面都能滿足學校的運轉需求。

(一) 書院的體制建設

1872 年真光創校時分為女童班和婦女班。婦女和女童的飲食和住宿分開，管理嚴格。²⁷ 原因有三：首先，女童與已婚婦女年齡不同，接受知識的快慢程度不同，適宜分開教學；其次，女童未婚，與已婚婦女分開便於管理；最後，設女童班旨在培養女基督徒及男宣教師之妻，設婦女部主要是培養女傳道，因培養目的不同而導致教學內容不同，宜分開教學。選擇已婚婦女而非女童作傳道的原因在於：“因年輕女子不便落鄉，須年紀老成有四五十歲者，出入始能方便；須與該地風土人情相熟者始能合用；要有膽志不怕人罵者，方可稱職。”²⁸

婦女班與女童班的學習期限最初為三年。當時教會的宣教對象多為廣州城鄉的普通婦女，多為文盲²⁹，女傳道只須向其講解大略教義教理即可，對女傳道文化素質要求較低，書院的三年學習已足以應付。之後有一個時期，教會發展迅猛，對女傳道的需求增加，真光書院隨即設立速成班，加速培養人才，但為時較短，情況好轉後即將婦女班的學習期限恢復。隨着廣州婦女教育制度的發展、知識的普及，

對女傳道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真光書院據形勢將學習期限延長，先改為四年，後改為五年，以培養出合格的女傳道。³⁰

1887 年，女童班分設，分為小班、中班和高班。小班的程度約相當於小學一二年級，中班約相當於小學三四年級，小班加上中班相當於初小程度，高班約相當於高小程度。女童班分設標誌着真光朝近代意義上的小學發展，這在真光乃至中國的教育發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二) 學生來源

清末中國民風未開，早期的教會學校招生不易。整體而言，建校初期生源不足是當時早期的教會學校普遍遇到的難題，入學者多為信徒家屬。真光建校後首批學生僅六人，包括兩名已婚婦女和四名女童，全為信徒或信徒家屬。四名女童中有兩名為姊妹，是當時美北長老會在廣州分會信徒的女兒；另外兩個女童是當時一所主日學的學生。婦女班兩個學生，一為浸信會在廣州按立的首位華人牧師之女，另一個是倫敦會的教友。³¹

為吸引學生，學校實行免費教育，不僅學雜費不用交，學校還提供食宿和日用雜物，每個學生“冬夏各贈衣一套……用具齊備，父母入學不費一文……”³² 此外，學生每月還有零用津貼。³³

甚至有學生在學校領的津貼超過家中父兄的收入。所以有些貧困家庭的女子因物質而入學，但家庭狀況轉好即紛紛離校，被稱為“吃教”。另一個導致學生中途離校的原因是早婚。當時中國盛行早婚，女子十四五歲即要出嫁，有的父母甚至編造藉口欺騙學校將女兒帶回家使其出嫁。傳教士們想盡辦法來保證學生數量，美國聖公會傳教士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 提出為保證學生中途不退學不逃跑，家長須和校方簽訂契約，學生在學期間不得退學不得婚嫁，若違反，學校要追回歷年學雜費，

在校期間一切均由傳教士作主等等。³⁴ 那夏理亦仿效此法，凡入真光者其父母須和學校訂立書面契約，三年不得退學，否則退回全部費用。

35

為吸引生源，那夏理還儘量改善真光的住宿條件。記載稱：

我們檢查了學生的宿舍，發現它們非常舒適。房間大約有汽輪上特等客艙的大小，即十英尺長六英尺半寬。屋裡有一床、一桌、一櫃。……一切都是那麼美好，我充滿了羨慕。你或許會說當然是乾淨的，但你絕體會不到那麼一種強烈的對比在我在中國看到的中國人的居住條件之間。³⁶

傳教士可能有意將對比誇大，但真光的學生居住條件高於當地居民的水平應該屬實。

經過傳教士的努力，學生人數穩步上升。1872 所收的首批學生僅為六人，1878 年增至三十多人，³⁷ 1887 年有一百多人，1893 年真光共招 176 名學生，其中有婦女 39 名，1894 年真光所招學生數為 190 人，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年。此時廣東美北長老會在教育方面已經取得很大的成績。據 1893 年的年報記錄，美北長老會在當時廣東地區建有四十所大小不等的學校，共招學生 1,485 人。³⁸ 囿於資料殘缺，不能在此一一列出每年的學生人數，但我們仍能看出真光書院學生數量的穩步增加。

(三) 師資力量

教會學校能夠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引領國內教育潮流，初期靠“新”，後期靠“質”。創校之初，教會學校引入西方先進的教育理念、教育內容以及教學方法等；到中國學校熟悉了西方教育體系並紛紛仿效，而且在數量上教會學校是無論如何也無法與之抗衡時，教會學校就改為以質取勝。這兩點的實現，依靠的主要是師資。真光在早期只聘女教員，且教員極少，校長、教員均一身兼數職。真光的早期教員包括傳教士那夏理和哈巴夫人，聘得的兩位中國

婦女，傳教士負責宗教課程與新式課程，華籍教員負責傳統教育。

1. 西籍教員

真光成立初期，外籍教師只有那夏理和哈巴夫人。哈巴夫人後因健康原因離開。1873 年，差會派那夏理的姊姊那大姑與克勞奇女士（Miss Lucy Crouch）來華協助那夏理。克勞奇在真光時間較短，但作用頗大。在那夏理回國休假和那大姑生病期間，書院全賴其支撐，直至那夏理二人返校。後克勞奇離開真光到另一間差會服務。在她之後來真光的是利曼女士（Mrs. Charles Leaman）。那大姑在真光初期主要負責學校宗教事務。因真光與博濟醫院毗鄰，那大姑經常到博濟醫院向病人及病人家屬宣講福音，系統向病人及家屬傳教，成績不俗。後嫁於嘉約翰醫生，隨即離開真光到博濟醫院創辦醫學院。

早期真光的西教員因都由差會委派的傳教士擔任，流動性很強，經常是在真光工作一段時間即被差會派往他處。長期在真光服務並起重要作用的除那夏理外，還有畢美意女士（Miss E. M. Bulter）、廖霞地女士（Miss Harriette Lewis）。畢、廖二人是那夏理的得力助手，三人被真光師生分別譽為“信”“愛”“望”。

畢美意於 1881 年被長老會遣派到真光任教。其在真光增設了算術和體育兩科，由此真光漸次引入西方的教育模式，呈現近代小學的雛形。1888 年，畢女士領導真光學生成立真光校內第一個宗教組織——祈禱會及傳道會，每周舉行一次活動，還組織學生下鄉傳教。畢女士為培養師資又設立主日學師範訓練班，教學內容採用那夏理所翻譯的聖經，教師由那、畢二人擔任。畢女士發現真光附近男童缺乏教育，便籌款在真光旁邊創立“培基學校”專門招收男童，並每日親赴學校主持，教師多由真光學生擔任。

廖霞地是真光西教員中年齡最大的，也是唯一不享受差會津貼而憑着對基督的虔誠自費

神話與宗教

來華的。廖於 1883 年來華，人稱“老姑娘”。在真光書院，廖“專授聖經，不兼他課”，並專門負責成年婦女的訓練。她還常到宿舍巡視，以聯絡感情，表示友愛，所以“生徒恒喜親之。”從前真光沒有專職看護，其職責就由女士擔當，學生有病，甚至“躬奉湯藥”。³⁹

美差會非常支持那夏理在真光的工作，不斷委派素質較高的傳教士來真光任教，這樣既可以用為真光補充新的師資，又可以把美國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內容隨時帶到真光，對於真光保持在女子教育領域的地位有重要作用。但由於她們都是外國人，無法取代華籍教師的角色。

2. 華籍教員

真光學校除教授宗教內容外還須講解中國傳統教育內容。為利於佈道，那夏理認為須聘女基督徒為教師。最初有一位符合要求的女基督徒在美長老會所辦唯一日學任教師，來真光時有兩個學生和她一起到來，但其只教了三周就因傷回家休養，後再未返回。為了應急，那夏理便擔任中文教師。⁴⁰因當時婦女受教育者極少，有知識的女子多出於富裕家庭，不會為物質利益出頭露面，要找到一個有知識的女教徒就更難，遂“不得已轉而求諸教外有名望才德者當之，”⁴¹只要受過教育能教授中國傳統典籍、閱讀和作文即可，對是否基督徒不再要求。後有兩名女子自薦到真光任教，原來皆為大戶人家女子，因家道中落不得已出外任教。此二人原來在家隨家庭教師學習多年，頗稱職。那夏理安排其一個任女童班教師，一個任教於婦人班。⁴²但那夏理並沒有放棄聘得基督徒為教師的想法，注重發展中國教師信教。最初的兩個教師，一個在真光婦女班服務多年後成了女傳道，另一個因某種原因雖未入教，但至少是基督教的同情者。

1884 年 3 月，兩位華籍教師辭職，以至教學乏人。那夏理聘得仁濟堂長老劉興賢遺孀劉楊氏與其女兒劉心慈為教員，使真光度過難關。劉楊氏“幼出名門，長婚望族，故能識普通文

字”。那女士將教師一職一分為二，以劉楊氏管理學生工作，劉心慈負責教學，當時劉心慈年僅十三歲。上課時，劉心慈在左，劉楊氏在右，按個人教授，先背後教。劉心慈對女書諸篇均能熟誦，故可“勝任愉快”，而且“居然為同學先進”。⁴³1885 年，劉楊氏病逝。那夏理另聘倫敦會傳道孔仁寶女士負責學生管理，教學仍由劉心慈主持。1887 年女童班分班，女童中班由孔仁寶負責，女童高班增聘羅聖愛管理，婦人班仍歸劉心慈主持。

真光的外國教師和中國教師，文化背景不同，故在合作方面存在問題，尤其是作為校長的那夏理同華籍教師之間的分歧，體罰即為一例。劉心慈稱：“一次本校教員鞭打學生，校長見之曰：‘不可用此法’。教員不滿意答曰：‘此後學生有事交回校長處理之，我無權負責也’。俟後事無大小必告校長，令其無限麻煩。”⁴⁴這其實是中西文化交流衝突碰撞的結果，在真光初期由於不得不聘用非基督徒華人教師，觀念分歧的出現有其必然性。後來真光聘請畢業生回校任教，取代外聘教師，向學生灌輸新的知識和價值，此種情況就極少出現了。1897 年真光慶祝創校 25 周年時，全校華人教師共有八人，其中七人為真光本校畢業生，且全為基督徒。但這畢竟是極端的情況，更多是那夏理和中國教師之間的融洽。1902 年那夏理回國度假，聖誕節時收到真光的三位中國教師寄來的聖誕禮物——一張三人的合影，背後寫着“你知道我們的心愛你……”⁴⁵1910 年以後，社會風氣漸開，真光開始聘請男性教師。⁴⁶

1872 至 1917 年期間，真光的師資變化有以下特點：首先，教師主體從原來以外籍傳教士為主到以華籍教師為主。在真光創辦之初，華籍教師僅能講授中國傳統典籍，其他華籍教師無法教授的新式課程由西方傳教士擔任。又因早期華人女信徒少，學校的宗教事務由傳教士擔綱。隨着接受新式教育的中國女性的增多，他們可擔任更多課程的教授任務，傳教士除少數仍在教學一線外，更多的是承擔學校管理的任務。需要注意的是，為保持教學質量，英文

一科始終由外籍教師教授。其次，真光教師從原來的清一色的女性轉變為男女各佔半邊天。1910年後，中國風漸開，真光開始延聘男教師，甚至以後還聘有男校長。第三，教師從外聘為主轉變為內聘為主。

(四) 課程設置與宗教活動

傳教士創辦學校的首要目標是培養佈道者以便傳教，而非改變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與文化。1872年真光成立後，學生主要學習聖經與中國傳統典籍。講課方式也是在中國傳統私塾的形式上加上傳教士教授聖經，但“以聖經為本”。每天課前學生先背聖經，上午讀聖經故事及相關書籍，然後覆書以問答式考課，課本採用《耶穌教要理大問答》。下午背誦孔孟諸篇等中國傳統典籍，不講解，無班別，由中國教書先生負責。此模式重背誦輕理解，“學生對於《耶穌教要理大問答》共計一百零七問，莫不熟誦如流，”傳教士稱：

我聽到她們一整天都在大聲讀書學習。你或許會問那樣聽起來不是很亂麼，那教師也不怕耳朵被震聾。但事實上，對於中國人而言讀書要大聲讀是完全必要的，而且讀書還要形成一定的聲調。對我來說，看到那些學生一個個走到老師面前，然後轉過身背對着老師以最快的速度背誦，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⁴⁷

直到1882年，學生們仍習慣這種學習方式，若建議她們做一些改變就會招致抗議，說她們如果默讀而不是大聲朗讀她們就無法學好功課。⁴⁸

因宗教活動需要，真光很早就設音樂科，那夏理親自教授。體育科在早期的真光沒有開設，有多方面原因，一位傳教士回憶，校園建築的長度只有禮拜堂的長度，在真光校園裡，只有長的走廊適於學生活動。但那些小腳女孩們運動起來不太方便。只是聚在一起聊天。可知，一是因條件所限，校舍狹小運動空間不足；二是因當時民風未開，婦女纏足，女性如果進

行體育運動會被視為傷風敗俗。在後期此情況有所改善。⁴⁹

1881年，畢美意來到真光，增加了算術和體育。真光漸呈近代小學教育的雛形。1880年代末，女童班分為中班和高班後增加了數學、化學、天文、地理、歷史、哲學與神學等科目。1903年又引入體操項目，但體育在早期的真光始終沒有真正開展，直到1911年劉心慈之女羅有節從嶺南大學畢業，回真光服務，引入“徒手操”和“印度槌”等體操項目，真光的體育科漸有起色。至此，體操成為真光的一門正式科目。

課程的設置日益完善，但是這一過程並不順利。真光建校之始，學生們在三年內要學習聖經、中國傳統典籍、閱讀、寫作、初級地理、初級算術、音樂（唱歌、彈琴）及手工。當時傳教士希望給學生增加新課程幾乎是不可能的，家長認為當時的教育形式是最好的，如要增加課程，家長寧可按照約定賠錢也要把子女領回。因此，傳教士增設課程時都謹慎小心，逐漸增加，後來學生需要九年才能完成學業，如果入學的年齡小則需要延至十二年。

真光作為西差會所辦之學校，對宗教自然非常重視，具體體現在宗教課程的設置、宗教活動的展開和大力發展信徒方面。那夏理在真光初期把培養女傳道作為學校的第一要務，她親自翻譯聖經到主日學講授，而且廖女士亦著《耶穌道理問答》統括聖經大意，為學生必讀。對學生的宗教課程要求極為嚴格：

從前功課，各生須背誦爛熟，由三位女士（那、畢、廖），每週到查二次，一切功課部籍，檢查呈閱，精明細察，一毫不苟。聖經要由始至終背誦一遍，（廖）女士聽各生背誦，須一字無訛，順如瀉水始給一百分，大公至正，故獲百分者極少。⁵⁰

神話與宗教

宗教活動方面，每日早晨在學校禮拜堂有傳教士主持的早會，學生必須參加，不准無故缺席；晚上則在教室有學生輪流負責的晚禱，傳教士監督。每逢星期日，全體師生到附近教堂做禮拜，禁止工作，禁止家屬探訪。

那夏理創辦真光後將宗教及道德的訓練作為教育重點，成為真光一貫堅持下來的傳統。真光的學生一向皆以德著稱。傳教士稱，當其去真光書院參觀時，原以為那裡的學生會缺乏禮貌，但無論是女童班的學生還是婦女班的學生皆非常熱忱地以中國特有的女子禮儀——萬福，來迎接他們，這位傳教士竟然為自己原來的想法而流淚。⁵¹

（五）師範學生的培養

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西差會在中國所設的教會學校蓬勃發展，廣州亦不例外，對教師的需求極大。真光由於為華南第一女校，教育水平居廣州之冠，畢業生供不應求。許多學生還未完成學業就被其他學校延聘任教。這些學生在擔任教師後仍不斷學習，對工作頗能勝任。1894年，真光開設短期師範班，為那些希望成為教師的學生提供專門訓練。師範班採取收費教育，許多學生都可負擔學費，對那些因貧困無法繳納學費者，真光先讓其完成學業，待其畢業後做了教師再慢慢償還。第一批招了二十四個學生，過了一年，有八個學生離開了師範班。但因有更多的女孩希望進入師範班，故一旦有空缺隨即就被填補。真光校舍狹窄，無法為師範班的學生提供住宿，幸而學校原被明心瞽目學校（Light-Giving School）佔據的建築因另換校址成了師範班學生的住所。初期辦學尚未正規化，真光的學生畢業時沒有畢業證書。1910年1月24號，真光書院這一屆學生畢業後被授予了畢業證書。其中十一個來自師範班，已在真光經過了九年的學習；八個婦女班的學生，學習了三年。

師範班的學生畢業後收到了極好的讚譽。其中一個學生，有人願意付其當時教師三倍薪

水，希望聘其為教師。另一個學生在另外一個大城市的師範學校任教。其中有的學生因表現出色而做了校長，便又返回真光挑選教師。

1908至1916年，真光共畢業144人，其中師範班73人，婦女班71人。師範班前五屆的47名畢業生中，44人做了教師，三個進入醫學院學醫。最後一屆56名學生中，有30個進入醫學院讀書，七個結婚，還有幾個在別的學校繼續學業。

同時，真光亦開設 Training School for Bible Woman，至1916年已有63個學生畢業，其中29個在小學任教，30個作 bible woman，四個在醫學院進修部分課程。

師資缺乏是影響中國近代教育事業發展的關鍵。教會學校恰好彌補了中國自身的不足，這不能不說是教會學校對中國教育事業的貢獻。⁵²

四、真光書院在中國教育史中的地位及影響

真光學校創立後，在培養傳教人員，吸收信徒的同時也為中國的教育、醫療事業的發展培養了大批人才。那夏理在教育培養學生時還宣講福音，鼓勵學生信教、傳教。據統計，1872-1917年間，學校共培養學生3,764人，其中教徒915人；做傳道助理的有742人，女傳道有310人；教師有286人，醫生114人，護士32名。⁵³

真光書院的創辦在中國教育史中佔重要位置，主要表現在：一，在廣東乃至華南地區開啟了女子近代教育之先河。真光書院成立前，廣州並無正規的女子學校，當地女子接受教育多為傳統的家庭教育模式。真光書院為中國女子教育提供示範，並引進西方各種近代觀念和實踐，促使廣東有了近代女子教育的雛形。⁵⁴二，為廣東培養了大批接受了初等教育及中等教育的女性。三，為廣東乃至華南地區培養了第一批職業女性。真光學生素質高，是早期夏

葛醫學院唯一從中招收女生的學校，這些學生畢業後成為廣東最早的一批女醫生。還有一些學生畢業後進入端那醫護學校，成為廣東最早的女護士。還有許多成為教師。四，真光書院通過多種教學形式，擴大受教育面，為廣東的普及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雖然真光書院創辦的出發點是為佈道，但無可否認，在客觀上其確實起到了傳播知識、啟迪民智的作用。五，真光書院注重師資培養，先是舉辦短期師範班，後又創辦正規師範班培養師資，直至師範學校出現。學校管理者注重新課程新教材的引入，使真光成為廣州乃至華南地區首間引入體育課的學校，亦是最新教材的引領者，使真光長期處於先進之列。不僅如此，那夏理在合適的時間發展真光的教育層次，在其任期內真光有兩次大的、關鍵性的轉變，一是真光從傳統私塾式的聖經班轉變為小學，二是創辦中學。所以，那夏理已不是一般意義上為傳教而傳教的傳教士，而屬一種新類型的傳教士——教育傳教士。她對廣東乃至華南地區的女子教育而言是開風氣之先。真光作為一所近代女校，除了為女性提供教育外，在解放婦女思想方面也作了巨大貢獻。因為國人有關婦女平等的觀念，以及倡辦女學的主張與實踐，幾乎都來自傳教士所辦教會學校的啟發。

從中國教育近代化角度而言，真光學校的創辦同樣具有重要意義。1872年真光書院創辦後，就進入到快速發展期，並促使教會教育在中國的普遍創辦。1877年，基督新教在中國所辦的教會女校就有120所，有學生2,084人。⁵⁵1902年，在美國差會所辦教會學校學習的女生已經有4,000多人，在此類學校的帶動下，清政府於1907年下令在全國開設官辦女子學校，以便更多的女子得到受教育機會。到1910年代末，教會學校已經和公立（國立、省立）學校、私立學校並列，成為中國學校教育的三大支柱。但教會學校有中國公立學校所不能比擬的特點。據不完全統計，初級小學的畢業生能升入高級小學的，國立小學中佔10%，在教會小學中佔21%；高級小學的畢業生能升入中學的，國立學校中佔3.4%，在教會學校中佔

10%。同時在校學生人數總是隨着年級的上升而遞減，教會學校的減少率要低於國立學校。教會學校具有工作的連續性、嚴格的管理制度、高質量的教育成果、良好的校風、穩定的經濟來源，成為政府在發展教育事業方面不可或缺的有益補充。⁵⁵

真光作為源自教會學校發展而來的私立學校，和教會始終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甚至在中國收歸教育權後教會對學校的影響仍然存在。中國女子教育的發展變化可以在真光找到印證，研究真光可以為我們現代的教育提供一些參考和借鑑。

註釋：

1. 趙春晨、雷雨田、何大進：《基督教與近代嶺南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頁。
2. 梁家麟：《廣東基督教教育一八〇七至一九五三年》，香港：香港建道神學院，1993年，第30頁。
3. 參見夏泉、徐天舒：《嘉道年間英華書院創校南洋研究》，《東南亞研究》2003年第5期。
4. 梁家麟：《廣東基督教教育一八〇七至一九五三年》，香港：香港建道神學院，1993年，第31頁。
5. 梁家麟：《廣東基督教教育一八〇七至一九五三年》，香港：香港建道神學院，1993年，第31頁。
6. 容閔：《容閔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石霓譯註，香港：百家出版社，2003年，第1頁。
7. 容閔：《容閔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石霓譯註，香港：百家出版社，2003年，第12頁。
8. 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0-41頁。
9. 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7頁。
10. 段琦：《清末民初美國女傳教士在華的傳教活動及影響》，《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3期。
11. *Chinese Repository*, vol.2, p.249.
12. 段琦：《清末民初美國女傳教士在華的傳教活動及影響》，《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3期。
13. 劉心慈：《真光光榮簡史》，香港：何陰棠私人出版，1972年，第4-10頁。

神話與宗教

14. Noyes, *A Light in the Land of Sinim-Forty-five Years in the True Light Seminary 1872-1917*, Kessinger Publishing, LLC, 2009, 17.
15. 梁家麟：《菁莪樂育我真光——真光創校一百三十周年校史》，香港：九龍真光中學校董會、香港真光中學校董會，2002年，第22頁。
16. Noyes, *A Light in the Land of Sinim-Forty-five Years in the True Light Seminary 1872-1917*, Kessinger Publishing, LLC, 2009, 13.
17. Noyes, *A Light in the Land of Sinim-Forty-five Years in the True Light Seminary 1872-1917*, Kessinger Publishing, LLC, 2009, 14.
18. Noyes, *A Light in the Land of Sinim-Forty-five Years in the True Light Seminary 1872-1917*, Kessinger Publishing, LLC, 2009, 15.
19. 《香港真光書院 25 周年校慶特刊》，第 52 頁。
20. Noyes, *A Light in the Land of Sinim-Forty-five Years in the True Light Seminary 1872-1917*, Kessinger Publishing, LLC, 2009, 20.
21. Noyes, *A Light in the Land of Sinim-Forty-five Years in the True Light Seminary 1872-1917*, Kessinger Publishing, LLC, 2009, 43.
22. 劉心慈為真光書院早期畢業生，其家族與真光極具淵源。其父劉興賢為長老會仁濟堂第一任長老，其母劉興賢師奶和她在真光畢生從事教育工作，任真光小學校長多年，其兩女羅道真和羅有節都曾任真光校長。退休後著有回憶錄《真光光榮簡史》一書，對研究早期的真光書院極具史料價值。
23. 劉心慈：《真光光榮簡史》，香港：何陰棠私人出版，1972年，第2頁。
24. 梁家麟：《菁莪樂育我真光——真光創校一百三十周年校史》，香港：九龍真光中學校董會、香港真光中學校董會，2002年，第32頁。
25. 劉心慈：《真光光榮簡史》，香港：何陰棠私人出版，1972年，第5頁。
26. Noyes, *A Light in the Land of Sinim-Forty-five Years in the True Light Seminary 1872-1917*, Kessinger Publishing, LLC, 2009, 242.
27. 廣東省檔案館藏《美長老會華南差會外國教士報告函件》，92-4-27。
28. 劉心慈：《真光光榮簡史》，香港：何陰棠私人出版，1972年，第62頁。
29. Noyes, *A Light in the Land of Sinim-Forty-five Years in the True Light Seminary 1872-1917*, Kessinger Publishing, LLC, 2009, 29.
30. 廣東省檔案館藏：美長老會華南差會外國教士報告函件，92-4-27。
31. Noyes, *A Light in the Land of Sinim-Forty-five Years in the True Light Seminary 1872-1917*, Kessinger Publishing, LLC, 2009, 27.
32. 劉心慈：《真光光榮簡史》，香港：何陰棠私人出版，1972年，第44頁。
33. 《真光女子中學遷校卅周年紀念特刊》，第2頁。
34. 李楚材輯：《教會教育：帝國主義侵華教育史料》，北京：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7年。
35. Noyes, *A Light in the Land of Sinim-Forty-five Years in the True Light Seminary 1872-1917*, Kessinger Publishing, LLC, 2009, 76.
36. 廣東省檔案館藏《美長老會華南差會信件》，92-4-10。
37. 梁家麟：《菁莪樂育我真光——真光創校一百三十周年校史》，香港：九龍真光中學校董會、香港真光中學校董會，2002年，第23頁。
38. 湯開建、顏小華：《十九世紀美北長老會在粵活動述論》，《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3期。
39. 劉心慈：《真光光榮簡史》，香港：何陰棠私人出版，1972年，第15頁。
40. Noyes, *A Light in the Land of Sinim-Forty-five Years in the True Light Seminary 1872-1917*, Kessinger Publishing, LLC, 2009, 22.
41. 劉心慈：《真光光榮簡史》，香港：何陰棠私人出版，1972年，第35頁。
42. Noyes, *A Light in the Land of Sinim-Forty-five Years in the True Light Seminary 1872-1917*, Kessinger Publishing, LLC, 2009, 23.
43. 劉心慈：《真光光榮簡史》，香港：何陰棠私人出版，1972年，第38-39頁。

44. 劉心慈：《真光光榮簡史》，香港：何陰棠私人出版，1972年，第47頁。
45. Noyes, *A Light in the Land of Sinim-Forty-five Years in the True Light Seminary 1872-1917*, Kessinger Publishing, LLC, 2009, 228.
46. 梁家麟：《菁莪樂育我真光——真光創校一百三十周年校史》九龍真光中學校董會、香港真光中學校董會，2002年，第33頁。
47. 廣東省檔案館藏《美長老會華南差會信件》，92-4-10。
48. Noyes, *A Light in the Land of Sinim-Forty-five Years in the True Light Seminary 1872-1917*, Kessinger Publishing, LLC, 2009, 239.
49. 廣東省檔案館藏《美長老會華南差會信件》，92-4-10。
50. 劉心慈：《真光光榮簡史》，香港：何陰棠私人出版，1972年，第19頁。
51. 廣東省檔案館藏《美長老會華南差會信件》，92-4-10。
52. [韓]李寬淑：《中國基督教史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279頁。
53. Noyes, *A Light in the Land of Sinim-Forty-five Years in the True Light Seminary 1872-1917*, Kessinger Publishing, LLC, 2009, 242.
54. 王爾敏：《十九世紀中國士大夫對中西關係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觀念》，《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台北華世出版社，1977年，第36-37頁。
55. 王立新：《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26頁。
56. [韓]李寬淑著：《中國基督教史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277-278頁。



